

铁儿”的名义出版。1936年7月17日，面对这部书下卷排版工作的拖沓，鲁迅在致杨之华的信中悲哀地写道：

秋的遗文……被排字者拖延，半年未排到一半。其中以高尔基作品为多。译者早已死掉了，编者也几乎死掉了，作者也已经死掉了，而区区一本书，在中国竟半年不能出版，真令人发恨（但论者一定倒说我发脾气）。

遗憾的是，鲁迅先生还是没有等到下卷出版就离开了人世。

提携青年朋友

在上海期间，鲁迅已是文坛明星，收入高，交际广，朋友多，还组织了“左联”，饭局和留饭——也就是居家请客，多了起来。加之上海地处长江口，是各种美食汇集之地，恰好满足了鲁迅的胃口，光顾过的餐馆有记载的至少75家。

在鲁迅家吃饭的，以进步青年居多，萧红、萧军是吃得次数最多的。萧红还给鲁迅做过东北名吃“韭菜盒子”。虽然做得不太好，鲁迅却爱吃极了，想多吃一个，还得向许广平请示。萧红是鲁迅家中最后一个留饭的客人，为她赴日饯行。怎知三个月后，鲁迅因病辞世。

1937年，上海的万国公墓，一位青年女子祭拜着鲁迅先生，她神色肃穆，低头不语，眼中饱含着悲伤的感情。这个青年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以《呼兰河传》驰名于中国文坛的女作家萧红女士。在这里面的那个留着一字胡的男人，是她的良师益友。

当萧红和她的丈夫萧军来到上海时，囊中羞涩，举目无亲。当鲁迅见到他们，他不仅没有嫌弃这两个落魄的年轻人，还取出了20块钱递给他们救急。在当时，这20块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。鲁迅的这笔钱对二萧来说正可以说是雪中送炭，因此萧红萧军对鲁迅更加敬重，三个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后来他们两个人干脆将自己的家搬到了鲁迅先生家附近。

两位年轻人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提携。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文字，极力推荐她的作品。萧红也很快成为了

萧红与萧军。



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

鲁迅不仅帮助了萧军和萧红，还对木刻情有独钟。萧军曾说：“在30年代，鲁迅先生的两只手，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文艺作家，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；另一只手是培育了若干青年木刻家——刘岷同志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鲁迅非常看重版画艺术，他觉得“当革命时，版画之用最广，虽极匆忙，顷刻能办”，“是最适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”。1930年，杭州艺专“一八艺社”的学生在鲁迅的关怀下开始木刻创作；1931年8月，鲁迅在上海主办“木刻讲习会”，从此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拉开帷幕。鲁迅逝世后，这些木刻青年有的留在国统区，从事抗战版画创作和抗日宣传，江丰、沃渣、胡一川、力群、刘岷、陈铁耕、黄山定、叶洛等则陆续奔赴延安。抗战版画的蓬勃发展，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战略眼光。

30年代初，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刘岷，沉迷于木刻版画，“一天到晚都在木刻，平均每天一幅，刻好就印”。从《鲁迅日记》记载的情况看，1933年1月到1936年3月，刘岷与鲁迅之间来往信件达51次。刘岷不停地把自己的习作拓印出来，送给鲁迅请求批评、指教，鲁迅“总是谈得那么热情、从容，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”。

刘岷的《无名木刻集》，请鲁迅先生写序。拿到先生的序言后，他本来计划把鲁迅手写的序言，用木刻版画的制作方法，“反贴一块木版上，用雕刀刻成阴字，但由于经验不足，在木刻的过程中将手书的宣纸稿摩擦烂了，未能刻成”。这个当时只有19岁的青年，“不加考虑地又给先生写了信并附上透明打字纸请先生重写”，鲁迅先生不仅没有怪罪，还很快重新写了序言，称赞这些新的木刻“是刚健，分明，是新的青年的艺术，是好的大众的艺术。这些作品，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，然而要有茂林嘉卉，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……”。

1934年初，鲁迅亲自编辑、自费出版的中国原创木刻集《木刻纪程》，收入木刻24幅，木刻的作者为一工（黄新波）、何白涛、李雾城（陈烟桥）、陈铁耕、陈普之、张致平（张望）、刘岷、罗青桢八人。在这本木刻集的序言中，鲁迅对木刻青年创作提出了希望：

采用外国的良规，加以发挥，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；择取中国的遗产，融合新机，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。■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

■

